



18-19世纪 英国妇女地位研究

王晓焰 著

A Study of Social Status of
British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18-19世纪
英国妇女地位研究

Study of Social Status
British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王晓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 王晓焰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01-006238-9

I .1… II .王… III .妇女地位—研究—英国—18~19世纪
IV .D44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6716 号

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

18-19 SHIJI YINGGUO FUNV DIWEI YANJIU

著 者: 王晓焰

责任编辑: 陆丽云

封面设计: 曹 春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印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55 毫米×23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数: 298 千字 印数: 3000 册

ISBN 978-7-01-006238-9

定价: 38.00 元

序

王晓焰本书涉及的内容是国内尚未作出充分研究的妇女史题材：18—19世纪英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她对国内外这一专题的研究现状和文献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是她不辞辛劳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参阅国内外对这一专题的大量研究文章和专著的前提下完成的。

“从社会性别角度，从文化层面探讨工业化的丰富内涵及其与妇女地位边缘化的关系”是本书的主题。一方面作者尝试批判性地借鉴国外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和观点——社会性别的视角及其理论，通过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不同层面的女性个人经验的分析，探讨两性的差异性与社会文化发展间的互动，探讨工业社会变革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探讨她们能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试图使我们了解工业化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并更加全面地展现英国工业化历史发展进程的丰富内涵。就此点而言，这本书不仅填补了我们对

这一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作用和贡献的知识空白，同时也为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晓焰借鉴当代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概念，力图在更深层次上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历史现象作出新的解释。例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使男性和女性由于生理差异和其他原因形成的历史性社会角色的分工进一步制度化，妇女的社会生活和地位因而在工业革命中呈现边缘化特征。王晓焰的书认为，18—19世纪的英国妇女的确承袭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然而她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也展现了多样性特征，她们并非被动地屈从，而是动态地适应着社会的变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晓焰通过研究认为，工业化对社会性别关系的重塑，即工业化的社会性别化过程建构了新形势下妇女的附属社会地位，但同时也提供了建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在这新一轮的男女劳动分工性别差异化的过程中，觉醒的妇女发展了女权主义意识，展开了争取与男性同等社会地位的斗争。因此，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迁也为妇女的解放运动创造了历史条件。

源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扩大着影响。无论人们可能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思潮持批判态度与否，作为创造理论，以建构知识体系，并在制度和实践中实现理论构想的社会性别研究和妇女学的宗旨和目的，已经被提到“国策”的高度，“使社会性别意识成为决策的主流意识”在联合国成员国中达成共识。女性主义及社会性别学的研究将推动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人类的进一步的解放，并向着更加完美的自由和平等的方向发展。因此，本书的出版无疑对两性关系的建设，对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王晓焰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成为她的指导老师。这期间王晓焰博士表现出她特有的勤奋和追求知识与学术的精神，以及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琐事中善于挤出时间，并有效率地组织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突出能力。王晓焰博士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来体验女性主义的思想，并解读英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的变迁。

读她的书，对她孜孜不倦地罗列细节，描述英国那一时期居于下层和中层的妇女的生活个案，使人感触良多。瑕不掩瑜，王晓焰的书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她对英国妇女史的研究，对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理解英国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等方面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何 平

2007年3月

前

言

长期以来，历史的编纂都以男性世界及其生活状况为主题，而忽略女性世界及其生活状况，纯女性史更为罕见。纵观人类历史的编纂，女性及其事迹基本上被排除在了战争、经济、法律、政府、艺术和科学领域之外。这种历史的撰写忽略了女性的活动、经验对历史的作用，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对女性史的研究可以增强我们对占半数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的了解。

18—19世纪是英国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变革时期，女性在近代早期英国历史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熟练技师，而且也依赖于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劳动力”^①（女性占

^① 萨利·亚历山大：《妇女形象的型塑：19—20世纪女性主义史论文集》（Sally Alexander, *Becoming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Feminist History*, London: Virago, 1994, first published 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 1976），第276页。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史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4页。

了相当大的比例)。早在 1757 年,一些英国思想家就鼓吹对男性和女性的地位进行界定,“这将对英国社会和英国作为世界强国地位的的稳定产生重要作用”^①。本文试图以当代社会科学有关社会性别的理论为框架,探析 18—19 世纪英国妇女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状况、她们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其原因,以便能够更全面地展现英国工业化历史发展进程的丰富内涵。

一、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概念和方法

1. 基本概念

女性问题可以说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古老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把女性列入了保护者的行列,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异无足轻重。然而,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居支配地位的不是柏拉图的思想,而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把女性看做只是孕育男性后代的载体,是男人及其活动的他者。康德和卢梭认为,两种不同的性别规定了某些适当的或不适当的行为准则。黑格尔把妇女归属于家庭领域,男人属于公共行动、科学和政治等领域。诸如此类关于男女性别社会角色地位的话语和规范,把女性传统地从属男性的地位自然化和普遍化。

女权运动和争取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意识在 15、16 世纪就已出现,有学者称其为“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今天女性主义者所关

^① 汉纳·巴克、伊莱恩·夏勒斯:《18 世纪英国的社会性别:角色、代表和责任》(Hannah Barker and Elaine Chalus, eds., *Gen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ole, Represent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London: Longman, 1997), 第 1—4 页。

注的许多问题——强暴、性骚扰以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那时就引起了妇女的注意。她们提出要求作为理性的、有尊严的主体应当得到合理的教育和他人的尊重。”^①这次浪潮在18世纪达到顶峰。1791年9月，法国知识妇女奥林珀·德·古热在献给法国王后的题名为《妇女和公民权利宣言》的文件中，以著名的《人权宣言》为蓝本，系统阐述了妇女权益，该文件共十七款，它被称为《女权宣言》；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一书，书中为争取妇女的受教育权与社会地位平等而呼吁，她被称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鼻祖”^②。

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主要是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三次女权运动浪潮。第一次是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运动，它“成功地使许多核心主张变成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妇女要求从改善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和家庭中的位置和机会出发，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为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斗争。始于美国的这场妇女运动得益于废奴运动的鼓舞和斗争经验。1920年，妇女终于在全美各州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英国妇女也达到了这一目的。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诞生。1949年，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出版，它为这一时期的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书中详细考察了女性身心的成长历程和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阐明了妇女树立独立人格、改变“他者”的地位、实现自身解放的途径，^③这本书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1963年，美国女权主义

①（英）约瑟芬·多落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李平：《世界妇女史》，海口：海南出版社；香港：香港书环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③（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

者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所著《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一书出版, 书中通过对弗洛伊德“生理就是命运”观点的批判, 引发人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重新思考, 继而断然否定“女性气质的奥秘”, 成为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和宣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第三次浪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女权主义者不但致力于创造理论, 而且设法使理论成为制度。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这场运动对社会的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等多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的目的是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正是在这场运动的高潮中诞生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四十多年来, 女权主义学者致力于改造知识的工作, 她们已使该理论成为跨学科领域的一套内容复杂的理论体系。

女权主义及女性研究 女权主义者及其运动按倾向可分为两类: 实践和理论, 或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前一种是指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把自身从父权制文化和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改变自身的从属地位而进行的运动和斗争, 这种形式又称为妇女运动或女权运动, 它既包括政治运动本身, 也包括运动所依据的意识形态主张, “女权主义”一词通常是指这一含义。后一种形式致力于从理论上解说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根源、结果及解决途径, 她们也投身于那些可能给性别关系带来深刻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制度的重建工程。她们既帮助建构了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 同时又提供了基于女性价值的对人类社会生活理解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以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学术思潮, 体现了女性主义运动向文化界、学术界的扩张。因此后一种形式比前一种形式涵盖更宽泛的领域, 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指向造成这些问题的父权制制度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 成为反主流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

文化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一。^①

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 认为, 女性主义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关注女性的经验, 从女性经验的视点出发界定需要研究的问题, 并把它作为衡量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指标。传统的研究只从男性的经验出发, 只关注男人所关注的那些社会问题。女性的经验是丰富的, 它包括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文化的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 构成了女性主义见解的来源。许多传统的社会研究从默认男人对女人控制的潜意识出发提出问题, 女性主义研究的目标是为女性提供她们所需要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因此, 女权主义独特的研究目的是为女性而研究。女权主义者的研究还把研究者本人的阶级、种族、文化、性别、信念和行为等因素置于其所要描述的事实中去, 其结果是“研究者对读者来说, 尽量不是一个以无形、匿名、权威的声音出现, 而是展示一个具体、真实和历史的个体”^②。这种从女性的立场出发也并不意味着将女人的特殊经验普遍化, 它试图为传统研究中缺席的主体和经验创造空间。女权主义研究的主体不是超经验的, 而是存在于其自身的生活以及与他人关系的现实中。

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 (gender)” 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当代从多种学科对社会性别的研究表明, 人的性别具有多种型: 以性染色体为基础的基因性别; 以激素为基础的生物性别; 以性别的生理特征为载体的生理性别; 以某种心理认同或否定为基础的心理性别; 以对不同性别的理解、规范和认可为载体的社会性别。前三种性别可

^① 吴小英: 《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5页。

^② 桑德拉·哈丁: 《女权主义和方法论》 (Sandra Harding,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Milton Keynes, Buckingham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9页。

归为生理性别，或性 (sex)；而后两种指性别的社会和心理差异及特征为基础的观念，是在社会文化中那些关于男女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等内容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性别称为“社会性别”。1876年出版的《法语词典》第一次对“社会性别”作了解释：“这是一种类别，或指女性，或指男性，……但不带感情色彩。”^①1992年，第三版的《美国传统英语辞典》是这样界定的，“gender”一词，过去主要用来指语法上的“男性”、“女性”和“中性”的概念；但是近几年来，该词被广泛用来指以性别为基础的其他范畴，比如社会性别的鸿沟和社会性别的政治。这种用法得到很多人类学家的支持，他们用“sex”这个词来指生理范畴，而用“gender”这个词来指社会或文化范畴。^②

“社会性别”与“性别”是有区分的，性别强调的是生理上的自然属性，而社会性别侧重的是社会性或文化上的差异，但是社会性别无法代替性别，它需要以性别作为分析的基础。事实上，具有自然属性的性别和具有社会属性的性别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社会性别强调一个完整的关系，它包括性别，但不直接受制于性别，也不直接决定性别关系。使用社会性别概念不是为了分解生物性别的作用，而是利用这一概念揭示掩盖在生物性别之下的有关性别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建构。

可见，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标签，是一个带有心理学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概念，由此可以说明文化是如何赋予每一种性别独特的特征的，同时也可以说明个体是如何使自己具备使自己与自身性别相吻合的特征的。强调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实际上是在强调人的性别在社会关系

^① 琼·斯各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② 琼·斯各特：《对社会性别和政治的进一步思考》，载劳拉·罗斯克主编：《越界的挑战》，钟雪萍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中所表现出来的双重属性，即人的性别特征是由其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决定的。换句话说，人的生命受到遗传和社会两种因素的影响，两性的行为和观念体现遗传和社会两种因素的作用，两性的共性与差异受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的双重作用。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开篇即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它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①

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丽特在《性的政治》一书中指出，从幼儿时代起，社会文化和制度就将男女置于分离的领域进行熏陶和训练，关于两性的行为模式及角色要求内化为个体的行为规范。通过同性的模仿、社会的奖惩等手段，个体的行为方式与性别定型观念取得认同，从而完成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这一过程是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影响下完成的。这种后天习得的性别角色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使之成为女性甘愿承受父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②

社会性别理论把社会性别不仅仅看做是一种个人性别身份的代表，还看做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桑德拉·哈丁将社会性别的含义概括为三个层次：^③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gender-identification）的核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其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进行性别认同。这种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童年时代，对终身产生影响；二是指两性关系分野下的社会结构，称为“结构性别”，即作为社会制度的性别差

①（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3页。

②（美）凯特·米丽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③桑德拉·哈丁：《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17—18页。

异，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是这种制度性的性别差异的反映，教育、司法、家教、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制度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文化或符号层面上的，它是指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这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男女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而取得的。例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理论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规范的是婚姻生活中暗含的一种权力关系。

在人类社会，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外，还有“社会性别制度”，它组织人类的性的活动，把人规范为男性和女性。正如存在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特征一样，社会同样具有性别不平等的特点。性别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和原因，因为男女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于是男女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就不平等。性别的角色差异即性别的分层反映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现实。在大部分的文化中，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前工业化社会，女性自然地隶属于男性，性别角色经常强调男女之间的相似性。工业革命后，强调的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女性主义妇女史的基本任务是揭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具体的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作用于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妇女史“研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中起到的作用”^①。

总之，性别的社会建构理论力图说明男女地位及其差异不是生物

^① 亨雷塔·L·莫尔：《女性主义和人类学》（Henrietta L Moore,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第110—120页。

力量所能决定的，因此，它也是可改变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开始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因素，主要不在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而是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这样，“社会性别”就成为与“阶级”、“种族”等同等重要的分析性范畴和工具。

女性学“妇女学”或“女性学”是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的别称，也有人称它研究女性群体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的科学。^①社会性别研究脱胎于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从其研究内容上看，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边界并不清晰。社会性别研究包括妇女研究，两者在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叠，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妇女研究的核心是女性，即通过对女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分析，了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社会制度如何作用这些因素。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妇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但包括对妇女的研究，也包括对男性的研究。它不仅研究妇女本身，而且把两性和两性关系共同纳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以妇女为研究主体和目的，而是关注两性不同的特点，其目的在于以平等的眼光对男女两性的行为和关系进行分析。第二，在理论的侧重点上，妇女研究以妇女为中心，尝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察社会中的性别建构。社会性别研究侧重研究私人及公共领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中如何调整。妇女研究一般与妇女运动密切相关，不少研究者都有女权主义的倾向。社会性别研究则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也给男性学者的参与留下了更大的空间。^②

^① 魏国英：《女性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② 张妙清：《性别学与妇女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女性研究的使命被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性别问题的研究和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的分析，启蒙妇女的两性平等的意识，并为妇女运动奠定理论基础，提供策略指导；二是消除文化界、学术界的性别歧视，改变知识界的不平等现状，提高知识妇女的社会地位；三是建立女性主义的知识图式、文化模式和研究方法，以修正和取代男性中心主义的（androcentric）文化模式、知识传统和研究方式。因此，作为女性主义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的体现，女性研究带有明显的反传统、反主流文化的特征。它从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发展到对传统学术的批判，从参与运动到转向知识讨论，其考察的范围几乎涉及每一学科领域的前提、理论框架、研究材料和结论。当代的女性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并逐渐走向学院化，但其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妇女运动。^①

2. 社会性别研究和妇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方法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国际化，围绕着妇女的解放问题，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学者把历史写作作为解释妇女受压迫，并寻求其和平解放等道路的政治工具。在20世纪60—70年代，有关英国近代早期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的研究是把父权制的概念作为女权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父权制”的视角 “父权制”来自古典的概念，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从社会体系而言，现代分析所用的概念是指男人统治女人；第二，赋予政治体制以特征的实践基础是丈夫和父亲对家庭的统治。尽管父权制在政治领域的含义已于17世纪发生转变，英国君权已由国会授予，父系的权威在家庭内部也受到质疑，但社会普遍认为丈夫和

^①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第11页。

父亲统治妻子、孩子和仆人的权力是上帝给予的。

1979年，围绕着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根源，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和希拉·罗波桑姆（Sheila Rowbotham）展开讨论。泰勒和亚历山大认为，纯经验的研究不能为问题的解答提供答案。^①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商品生产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并由此产生了阶级的概念和理论。这套理论是犀利的，但并非穷尽了人类的知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是在经济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用“性阶级”这样的术语来解构阶级的产生，它意味着研究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必须与经济制度相连。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私有制取消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显然，对性别问题还需要在经济制度之外来考察。所以，他们强调以父权制概念为理论依据。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蒂·本妮特（Judith Bennett）也认为，研究妇女史必须研究父权制的形成与发展。^②

罗波桑姆则认为，如果仅仅采用父权制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和阶级差异等核心问题。因此，他主张以阶级分析法对妇女史进行研究。在追溯女性二等地位的经济根源后，他认为，几乎在所有社会里，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与生产和财产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二等地位的个人和心理的影响，可视为源于生产和财产等因素与工作的特殊关系。^③如果把父权制作为妇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将不

① 芭芭拉·泰勒：《新旧耶路撒冷：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Barbara Taylor, *Eve 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t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Virago, 1983），第1—4页。

萨利·亚历山大：《妇女形象的型塑：19—20世纪女性主义史论文集》，第366页。

② 朱蒂·本妮特：《女性主义和历史》，载《社会性别与历史》1989年第1期（Judith Bennett, “Feminism and History”, *Gender and History*, No.1, 1989），第254—267页。

③ 希拉·罗波桑姆：《女人的意识、男人的世界》（Sheila Rowbotham, *Woma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Middlesex: Pelican Books, 1973），第20页。